责任编辑：张丹丹 E-mail:zhangdan2003731@tom.com 电话：010-62807315
758103815@qq.com

心中要有“永不消失的党校”

□王永昌

这是我第三次来中央党校进修学习了，每次都有丰厚的收获，这次也有着别样的情怀和成果。

中国梦：中华儿女心中内在的理想意志

在全党全面开展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之际，我们专门有2个月在中央党校学习培训，就有更多时间来学习领会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而且党校的老师们还专门进行了辅导。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号召。中国梦，平实、简洁、响亮，具有深厚宽广的历史感和催人奋进的感召力。

看了一些阐释中国梦的文章、听了辅导课以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尽管对中国梦可以作深入系统的理论学术研究，但千万不应把中国梦抽象化、学究化、空洞化，也不要简单地用已有的理论思维、理论框架去诠释中国梦。中国梦的核心意义，在于用这一普天下中华儿女们的“最大公识”，感召炎黄子孙们通过自己的辛劳汗水、聪明才智去实现自己事业的成功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把中国梦内化为我们心中生生不息的崇高理想，转化为拼搏奋斗的行动意志，我们就能踏踏实实地向着中国梦的理想山峰迈进，我们就能远行，就能更快地“圆梦”。

我们再也不应该去做这样的蠢事了：人们心中刚刚萌发为了自己也为了民族生活得更美好而拼搏的“梦想”，就用“假大空”的说教“蒸发”掉、抽象掉。相反的是应具体化、实在化、内心化。

有理想，才能远行；有方向，才有追求；梦在远方，路在脚下。

实现梦想：增强战略定力和国家实力

我们要跃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国梦，必须“翻山越岭”，跨越“沟沟坎坎”。对我们自己来说，当今中国，的确正处于实现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由发展中国家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正走在现代化建设的“半山坡上”。这是史无前例的“大坡”，是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形态的“新坡”，也是充满荆棘、陷阱的“陡坡”。这是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阶段，是一个吃力爬坡、艰难困苦的时期。这个阶段，拼的是意志耐心、信念毅力，而最忌讳的是好大喜功、心浮气躁。

换句话说，我们要增强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理想理论、道路、制度的自信心，要增强国内发展大局的战略定力，要义无反顾地坚持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动摇。

在两个月的学习培训期间，党校老师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金融、科技、外交等方面，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当代世界发展格局，又恰逢“乌克兰动荡”事件，课堂上的知识和世界舞台的现实，都使我们收获良多。其中一个重要启迪，就是人类迄今为止，仍然奉行动物界的普遍定律：“实力说话”规则。

当然，我们人类是有自觉思维、有语言、有预判能力的高等动物，人类社会也比动物世界复杂千万倍，而不是仅凭本能行事。所以，人类常常口头上讲公平正义的理想主义，但实际行动上却是以实利主义（现实主义）为准绳的。同时，人类社会、国家、世界组织对“实力”的运用、对“实利”的谋取，有着自觉的千变万化的“手段”“技巧”。这就是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战略谋划和运用的“空间”所在。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实力说话”“实利为本”，是国际关系、国际战略的基本“准则”。因此，我们讲这个战略说那个规则，最根本的还是要着力于提升我们国家自己的实力。这就是我们国际国内一切战略基点和定力之所在。

“告别党校”：心中要有“永不消失的党校”

在即将退休之际，作为党员领导干部，能有机会又一次来中央党校培训学习，是很值得珍惜的。

这两个月期间，我走遍了党校校园内大大小小的路，也几次有意识地围着校园周边散步，除了锻炼身体外，主要目的，是想记下党校的山山水水、礼堂教室、花草树木，当然还有许多可敬可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因年龄关系，今后我不太可能还有专门的机会来党校学习培训了，我要珍惜这次机会，要把党校永远留在心中，可以常常去想起它、回忆它，以此从一个侧面去想想党的历史和现实，去照照自己的心灵。

在中央党校三次学习培训期间，我曾三次参观了党校校史陈列馆。每次重温党校走过的路都令我思考许多。比如，我们党建党时只有几十位党员，为什么能迅速发展壮大？为什么能夺取政权建设新中国？为什么我们党一开始就那么重视党校建设？当然，也包括我们党的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的偏差和失误？原因、答案自然有很多，但我想到的是：党的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学习教育、思想理论武装对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一个善于学习的政党、民族，就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战无不胜。同样，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只有乐于学习、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牢记党员干部的使命职责，不断净化自己心灵，提高党性修养和素质，才能牢记党的教导，不负人民重托，保持高尚情操，清白做官、勤奋做事、老实做人。

“时间都到哪儿了？”时间就是人生。在党校两个月学习培训期间，我尽最大努力多听些讲座，多读些书，多写点心得文章。学习是辛苦的，但也是快乐、有回报的。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党员领导干部更应该如此。到党校学习培训的时间是有期限的，但党性锻炼是无止境的。我想，在我们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中，应该有一所“永不消失的党校”。

（作者系中央党校学员）

我与中央党校

官诚则民信

□范一直

曾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研究室主任的吴季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时，对前苏联的解体做过相关调查。他说：“前苏联和西方的外交官一致认为：选拔了一批不诚实的干部，他们又逐渐结成群体，是前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西方任用文官有两大条件。一是有教养，二是为人诚实。其实，在“有教养”中，就已包含“诚实”的应有之义。之所以拈出第二条，无非是强调官员的诚实守信之重要性。

干部品性是否诚实可信，居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泱泱大党的命运，正好应了《管子》说的“诚信者，天下之结也。”（“结”义为“关键”）民无信不立，商无信不发，官无信不贤。“官”的诚信与否，更兹事体大。

韦伯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曾说到在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工厂的烟囱和教堂房顶上的十字架经常同步矗起。办企业、做生意、搞买卖，固然要追求利润，但建立在信仰基础上，同时有法治保障的诚信绝不可缺失。市场经济越成熟、越规范，对诚信的要求也就更高、更严格。自由竞争固然需要随机变通，但这只能局限在“术”的层面，而不能上升到“道”的境界。市场经济的“正道”是法制经济，其核心在于严守法规、信守契约。“公司集团”的英文——“托拉斯”（trust），本义就是忠诚、可信、靠得住。

韩非说：“巧诈不如拙诚”。某民营企业家在办公室高悬“诚信”二字，旁有笺释：“有诚则成，能信则兴。”善哉！“诚”“信”和“成”“兴”之间不乏内在联系。

政者，正也。在政治生活中，诚信是为政者不可缺失的基本品质。正心和诚意密不可分。一个不诚实的公务员，要为人正派，办事公正，难矣哉！而缺诚少信之官员，要得到民众信赖，更难。如清代的金璎在《格言联璧》中说：“平日诚以治民，而民信之，则凡有事于民，无不应矣。”反之，不能“诚于治民”者，当“有事于民”时，“民”则自然“不应”。

而今有些领导干部，时不时在官场上演出“瞒”和“骗”的丑剧、闹剧，有的还很“玩得转”。他们视诚信为“悖时”或“不识时务”，成了鲁迅曾痛贬的“做戏的虚无党”。欺上瞒下、阳奉阴违、弄虚作假，形式主义屡禁不止、假话空话到处流行等现象的出现，除了制度因素外，很大程度是由于某些官员缺乏起码的诚信品格。至于贪污受贿、徇私枉法之类的腐败行径，在表现形式上也离不开瞒和骗二字。一“瞒”二“骗”，诚信安在？

一个“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的干部，无论在工作作风或在廉洁奉公方面，自然都能经得起考验。把解放思想和诚实忠信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以种种自以为是的圆机活法来替代诚信作风，暴露了彻头彻尾的市侩哲学和乡愿习气。

官诚则民信。党风、政风对民风和社会风气多有示范和导向作用。如果官员普遍缺乏诚信，官方又谆谆教导老百姓要讲诚信，其效果恐怕会适得其反。

建立诚信社会，首先要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诚信做起。不诚信的奸商，纵使一时能赚得昧心钱，但“滑头生意”终归做不长，也很难做大。而官员如果缺少政治诚信，不仅不受到追究，反而得以提拔重用，则吏治之腐败也就可想而知。现阶段民众的“仇官”心理，大多以不信赖当官的为前提。“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社会诚信之底线几近于崩溃，是因为官员们的政治诚信，比民间的社会诚信崩溃得早、崩溃得更普遍。

老百姓在家庭教育中通常把“不说谎”作为培养孩子道德品性的第一要义，而这正是要求做人以诚信为本。不诚不信，焉能在天地间立住脚跟？

有诚则成，能信则兴。于个人、于企业、于商家是如此，于党、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者单位：浙江省安吉县委党校）

随　笔

联系群众需要避免的几种错误倾向

□刁兴泽

目前，正在开展的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已深入人心，效果明显，为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政治思想保障。但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几种不良思想倾向，它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联系群众的效果，蒙蔽着群众的视线，需要我们克服。

一要避免“老好人”主义。老好人不好，我们都清楚。可现实生活中总有少数人又在自觉不自觉地奉行“老好人”主义。“老好人”没有做人原则，没有是非标准。“老好人”看似“与人为善”，实则世故圆滑。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它一坏党内关系，二坏党内批评，三坏党内纲纪。“老好人”是开展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大敌。防止“老好人”思想，关键在于思想认识上除去滋生“老好人”的土壤，确立科学的识人标准，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建立起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老好人”得利的用人机制。其中特别是选好干部不能简单以票取人。简单以票取人，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往往使一些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的干部得不到客观评价，而一些“老好人”反而得到提升。由于缺乏相对科学的工作机制，一些地方和部门出现了一切凭票说话，机械地“以票取人”，致使一些干部联系群众不是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而是拉帮结派“建票仓”，四处讨好“争票源”，左右逢源“拉票助”，吃喝玩乐“贿票选”等等，助长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必须予以纠正。

二要避免“江湖义气”。“江湖义气”表面上体现了“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为了“哥们”可以“摆平”、可以“搞定”。其实质是在欲望的驱逐下，官商勾结变成利益共同体。这绝不是“为民”，不过是为一小提利益群体而“服务”，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寻租。真正的为民应当是能够以信念的坚定来支撑持之以恒的坚持和坚守、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来践行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以始终如一的姿态来恪守人民公仆的精神高地。因此，密切联系群众必须树立强烈的百姓情怀，心系百姓、心忧百姓，无怨无悔地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决不能变成“江湖路线”，每个领导干部都要坚守法律底线，都要学会拒绝所谓朋友提出的无理、非法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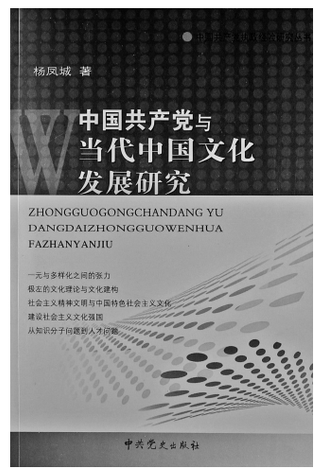
三要避免“拉帮结派”。“帮派”思想体系自古有之，它历来是执政之患。极少数人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在党内不称同志，却称兄道弟，对上级不叫领导叫老板，更有甚者大肆编制关系网，搞亲亲疏疏、团团伙伙，有的直接以“寨主”自居，缔结同盟。在他们那里，“帮派”等于原则，感情就是政策。纠其原因，一是少数党员党性不纯。对上级搞“帮派”是为了提拔重用，对同级搞“帮派”是为了搞好关系，对下级搞“帮派”是为了打好“群众基础”。二是现行体制不完善。少数人当正当利益因体制不健全得不到组织的重视时，就可能得到“帮派”领导或朋友的关照。三是封建意识的影响。无原则的意识是一种封建意识，它讲的是私人情面，重的是“帮派”利益，至于国家和集体利益就另当别论了。为此，一方面，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联系群众要搞五湖四海，要以宽广的胸怀和视野对待群众。另一方面，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使“帮派”“朋党”无立锥之地。

四要避免“不愿作为”。少数领导干部奉行“干事就出事，出事就被查、不干事就没事，没事就不会出事”的信条。我们现在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攻坚克难，矛盾不可回避。我们应当正视矛盾，集中群众智慧解决矛盾，同时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每日三省吾身”，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从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细节上严格要求自己。如果怕出事，那还是自己有问题，这正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意义之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茌平县委党校）

总结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历程与经验的力作

□曹　普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工作和文化建设越来越重视，关于文化发展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正成为学术理论界“聚焦”的一个热点领域。最近，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杨凤城教授撰著的《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一书，就是众多专题研究文化问题的著述中用功深细，见地独到，别具特色的力作之一。

中共发展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大时期，作为中共领导的事业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就不能不与这三大时期的特征有某种契合。在书中，作者把悟了这种契合，以纵深的视野，对中共90年来特别是执政60年来文化观的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转变而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化发展的两次转型作了提纲挈领式的揭示：所谓文化观的转变，即从文化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建设革命型文化向文化为人民和社会主义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所谓两次文化转型，即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元化文化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文化的第一次转型和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从一元化文化向一元指导下的多元化多样化文化发展的第二次转型——第二次转型并非也不可能是简单的复归。“一次转变两次转型”的概括，反映了时代变迁之下中国文化的历史际遇，拎起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嬗变的主脉络，是全书对中共历史、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文化发展史进行总体观照而作出的重大学术判断。

作者在全书的后记中特别提到，鉴于作者的“中共党史专业背景”，“本书主要是一种历史写作”，也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分阶段考察，重在廓清执政党关于文化建设的理论政策演变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分析每个阶段的主要问题和时代特征，并在历史叙述的同时总结提炼执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教训，以史鉴今。这个意图在书中得到了切实贯彻。全书清晰地呈现了60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曲折推进的不平凡历程：自1949年新中国建立，伴随政治秩序的改变，中国开始了艰难的文化转型与重建，经过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一系列文化批判运动，到1956年，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一元化文化形态确立，文化重建和转型的任务初步得以完成。在此之后，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十年中，中共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地位的同时，一方面大胆探索如何实现文化的活跃和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在探索中又发生了较大偏差，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交织并存的复杂状况，最终“左”的思想和实践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大革命”发生后，文化被绑缚在政治的战车上，文化“政治化”被推向极致，十年“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实为十年文化浩劫，教训至痛且巨。“文革”结束后，文化领域率先拨乱反正，新的“二为”方向确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命题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文化建设方针先后出台，中国文化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开始由长期一元文化向一元指导下的多元多样化文化转型，迎来了新的发展时代。进入21世纪，面对国际国内文化竞争发展的新态势，党和国家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大发展大繁荣的道路上扎实前行。以上对中国文化发展历程所作的大跨度、“俯瞰式”描述，使我们看到了一幅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当代中国命运同荣枯、共消长的生动图景以及中共的文化方针政策与文化发展实践之间的紧密联动关系。在作这种叙述时，作者不求面面俱到，不发泛泛之论，而是在不遗漏重大问题的前提下，剔刈枝蔓，全局在握，择取各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和最重大的事件作多侧面剖析、多角度开掘，既保证了历史考察的系统完整，又使得研究有纵深有延展有力度。

“历史家的首要任务是如实叙述”“秉笔直陈”。但是，真正严肃的历史研究者——包括中共党史研究者的任务，不能仅止于搜罗、辨定和叙述史实（史料），还原历史的本然；更重要的是对搜罗、掌握的史实（史料）作出诠释、分析和评判，回答历史的所以然。因此，相较于“史才”“史学”，富有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史识”，才是史家更为重要的品质。杨凤城教授的专著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品质。专著不仅分阶段系统叙述了执政党的文化方针政策出台的情况及其实施效果即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响——如上所述，而且站在今日的高度，又基于昨日之“史实”，对各阶段历史的因果由来、是非得失、经验教训等进行了深入总结并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和见解。比如，在评论新中国建立之初文化转型问题时，作者认为，这个转型主要不是随着社会变迁而由文化自身的调适和新陈代谢完成的（内源性），而是在政治权力主导、意识形态灌输、舆论宣传引导等文化自身因素之外的力量交互作用下完成的（外源性）；革命战争、阶级斗争思维及其支配下的惯常做法被平移到文化领域，理应是文化转型主角的知识分子非但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反而成为了文化转型中被批评甚至批判的对象——第一次文化转型中的许多特征和问题均根源于此。再如，作者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发展的历史教训时，明确提出，切忌用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理念、思维和做法来看待和处理复杂的文化问题，切忌追求简单明了、敌我二分的文化是非评价和判断；执政党要慎用政治强权来推崇和推行某一种文化内容和形式而动辄批判和否定另一种文化内容和形式，等等。这样基于个人感悟而作的评论所在多有，分析剀切，给人启发，充分体现了作者所追求的“主要在自身有思考和见解方面着力”的写作旨趣。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书　评



悠悠历史创基业——新落成的山东省委党校

校园风光

刊址：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电话：（010）62805132　邮政编码：100091　订价：全年88元　订阅：本报发行部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照排：学习时报社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